

东亚价值是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

在西方价值随着西方的崛起而成为所谓“普世价值”的时代，在西方世界出现了把东亚文明贬残为停滞的文明之殖民话语，也出现了所谓的“韦伯命题”。

东亚的价值——

DONGYU
DE
JIAZH

吴志攀 李玉主 编
包茂红 副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东亚的价值

主 编 吴志攀 李 玉

副主编 包茂红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的价值/吴志攀,李玉主编;包茂红副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301 - 15992 - 7

I. 东… II. ①吴… ②李… ③包… III. 东亚 - 价值(哲学) - 研究
IV. D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7837 号

书 名: 东亚的价值

著作责任者: 吴志攀 李 玉 主编 包茂红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尚 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5992 - 7/G · 270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minyanyun@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6.5 印张 381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现代化已经成为东亚国家的追求目标。尽管东亚各国自身的国情不同,发展路径各异,但是大目标却惊人相似。同时,在不知不觉中,发达与先进的西方已经成为东亚国家现代化最重要的参照系。从东亚近代史一路风雨兼程来看,东亚国家向西方学习,是既被动又主动,既茫然又明确,既屈辱又不屈。这个历史进程,还在继续。

而西方的现代化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是一个大话题,其中包括地理大发现,科学技术的创新,社会的进步,制度的建立与建设,乃至对外扩张取得市场与资源,等等。但是最根本的,是人的解放,人的思想的解放,人自己发现了自己。在走出中世纪时,一盏盏明灯在欧洲自身燃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人到一个个群体。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大方向上一致,但各自的具体道路则很不相同。同时,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也绝非鲜花铺地,其代价之大,绝非今天就可以画句号的。

随着近现代西方在世界的扩张,另一个现象也出现了,即原本多姿多彩的世界被西方单一的话语体系归纳并描述。对此,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批评说,这完全是在“欧洲的路灯下看世界”。欧洲自己燃起了明灯,又为照看别人竖起了路灯,这是一个大历史现象,它要变化。而变化之际,就是地球上别的地域,包括东亚在内,重新自我发现之时。

东亚的自我发现,走过的是与欧洲、美国不同的道路。它是先受到外部的压力,被“他人的路灯”照亮,继而在自强不息的奋斗中,重新发现自身文明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的明灯。

东亚有自己的精神资源吗?在西方力量到达东亚之前,人们用何种物质与精神的方式在自我完善、生存繁衍?精神资源,包括人对宇宙自然

的畅想与歌颂、对世事及人生的思考与参悟以及在应对各种难题时的定力与能力。所有这些沉积下来,就是一种文化命脉。文化是一种生存能力。它自成体系,渗透到群体与每个个体的血脉之中。一旦遇事,自然发力。2008 年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天崩地裂,但是我们在巨大悲痛中体悟到了人的精神传承。这种传承还将继续传至子孙后代。因为它本身就是远古精神的现代回响。诗人李白在一千多年前不是已经描绘了吗:“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

从现有的文字记载来看,东亚的精神传承是一个巨大的体系。它的本色就是开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和而不同”,这是一种精神气质,闪烁着灵性与智慧之光。

目前,全球正在和另一场人祸拼搏,这就是 2008 年秋天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渔阳颺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身处经济全球化大潮之中的东亚,需要沉着应对,也需要再一次调动潜能,在新的挑战面前展示自身的价值。

袁 明

2009 年 3 月

编辑说明

价值指事物具有的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与功能。价值观是人在认识各种事物基础上形成的对其价值的总看法和根本观点。尽管东亚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无论是东亚人还是来自其他区域的人都能在这里感受到一种相似的、与欧美世界不同的价值观念。东亚价值尽管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了进步和曲折,但是,它就像永不停息的时间一样一直延续下来。东亚价值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同时也是通向未来的。

在当代,随着东亚经济的起飞,这个曾经形塑了东亚在世界上的核心地位、但在近代一度被置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东亚价值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当世界面临许多从国内发展和国际局势变化中涌现出来的问题,但用西方价值无法解决时,有识之士纷纷把目光再次投向东亚的价值。新时代和新形势要求对东亚价值做出新的解释,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应运而生。例如,东亚是否存在一种统一的价值?东亚的价值是什么?东亚的价值如何被“他者”化?东亚的价值如何被重新发现?东亚价值上如何生长出自己的现代性?东亚价值对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建设和谐世界有何启示?等等。

汇集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发表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为推进东亚价值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助力,促进东亚古老价值的创生和复兴,使其在推进东亚文明的复兴以及世界的和谐与繁荣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是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编辑和出版本论文集的宗旨与目的。这些论文都是作者倾注精力、潜心研究的成果。阅读这些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定会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本论文集共收入 20 篇论文。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我们依据论

文的内容,将全书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的是东亚价值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这部分收入了孙歌、贺圣达、李文和阮秋芳 4 位学者的论文。这些论文把东亚价值的历史与未来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认识论层面到具体路径、从单个国家到东亚整体,全方位地探讨了东亚价值对东亚在未来世界发挥作用的意义。

第二部分论述的是天下观与东亚世界秩序。这部分收入了李晨阳、张启雄、村田雄二郎和龙谷直人 4 位学者的论文。这些论文既有研究综述,又有哲学层面的分析,还有经济史研究,这无疑会拓展并加深对东亚固有的天下观和国际秩序的理解。

第三部分论述的是东亚价值与现代社会建设。这部分收入了陈来、白永瑞、陈弘毅、贾庆国、潘维、陈峰君和王庆东 7 位学者的论文。这些论文既从历史实践上总结了传统价值在东亚现代社会建设中的经验,又从理论上分析了传统价值促进东亚社会转型的潜力和可能性,还展望了传统价值对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

第四部分探讨是否存在一个“亚洲价值观”。这部分收入了庄礼伟、山室信一 2 位学者的论文。这些论文阐明了在亚洲确实存在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这种地域价值观不但仍然在东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将会对全球普遍价值的形成产生更大影响。

第五部分论述的是东亚环境观和可持续发展。这部分收入了约阿希姆·拉德卡、宋荣培、何怀宏和包茂红 4 位学者的论文。这些论文将关注的重点从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把思考从现世扩展到未来,从而把传统与现代和未来有机联系在一起。

著名学者袁明教授在百忙之中欣然为本书赐序,我们深表感谢。她在序中,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视角,对东亚价值及其意义作了精辟的论述,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

需要说明的是,基于学术讨论自由、尊重作者学术观点的考虑和文责自负的原则,编者对作者的学术观点不作任何改动。各篇论文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所见,不代表编者。

在本论文集编辑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朋友和机构的帮助。各位作者

不吝赐稿,提供论文,使论文集的出版得以实现。北京大学历史系梁志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歌研究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启雄研究员、《北京论坛》秘书长严军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元周副教授在组稿方面鼎力相助。韦民、王元周、李道晴等先生为论文集提供了清晰流畅的译文。责任编辑尚明认真负责。在此,我们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因编者的水平所限,书中还可能有不少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9 年 1 月

第一部分

东亚价值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

东亚视角的认识论意义

孙 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一、中国社会既定的东亚视角及其问题性

关于东亚的讨论,到今天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以至于一提到“东亚”,人们就会无意识地感受到某种既定的对象。可是,追究起来,这对象却有些含糊:它是指中国、日本、韩国,还是指中、日、韩加上北朝鲜,抑或再加上越南,或者再加上东南亚?我们到底把中、日、韩这个最常见的框架称为东北亚,还是语焉不详地称其为“东亚”?

比起这些地理性的问题来,更难于回答的是在今天中、日、韩三国知识分子交流的时候那个常常逼到面前的问题:中国社会为什么缺少亚洲意识?这是否与中国中心的大国意识有关?

中国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分子常常觉得,与其进行所谓“东亚论述”,不如直接进行东西方对话;或者建立其他的视野更具有现实的紧迫性,比如中国、俄罗斯、印度三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对话,大概要比东亚对话更具有现实性。这是因为,作为一个与东亚、南亚、西亚和很少被作为单位提及的“北亚”地区都接壤的国家,中国很难完全地塞进东亚这个框架中去。“为什么一定要谈东亚?”

确实,如果我们追踪一下东亚论述在中国的兴起,可以发现它其实并不是从我们的知识土壤里“自然地”生长出来的,毋宁说它有很大的移植色彩。这移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它使得日本还有韩国(或者说是“亚洲四小龙”)进入了中国社会舆论的视野,并借助于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把冷战时期并不一体化的东亚视为

一个整体；而日本和韩国积累至今的东亚研究，以及日本与韩国的各种基金会推动的东亚研究项目，都对中国的东亚论述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另一个方面是来自于美国的地域研究框架，“亚太地区”的视野与美国大学里的东亚系框架，都使得东亚变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可以说，为了回应国际上的种种新的趋势，中国的言论界也把东亚作为一个话题，并且越来越觉得它顺理成章地原来就在我们的意识当中。

但是，仔细观察一下有关东亚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形成的东亚视角是相对薄弱的。这种薄弱并不意味着东亚话语不流行，也不意味着把东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研究成果积累不足，而是意味着，关于东亚的研究在中国知识界并没有获得认识论上的相应位置，它并没有把上述种种问题作为需要回应的问题，也几乎没有进行回应；同时，由于东亚研究基本上停留在经验层面，这种经验性研究的本体论对象很少受到质疑，因此，在中国的思想与知识生产的层面上，东亚研究的定位是不清晰不自觉的。在这一基本状况之下，我们可以大致把当下构成了某种共识的关于东亚的视角做一个简单的勾勒。

比较通行的东亚视角，是传统儒学的视角。这种视角以高度抽象的方式把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通过“儒学”的框架统一为一个整体，并且力求论证儒学中最基本的抽象价值观念（例如“仁”、“中庸”）在上述地区的普遍性。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很有限。即使在直观意义上，我们也很难断言儒教在东亚地区具有同一功能，因为我们无从解释为什么同样受到儒学影响，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更无从解释朝鲜半岛在被迫分为两个部分之后，它的“儒学”到底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中起作用。假如我们把儒学视为已经过去的某个历史阶段的产物，那么下面这个问题将是不可回避的：儒学在东亚的不同国家里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即使在儒学的鼎盛时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儒学也不能够毫无媒介地涵盖三个国家。在不同的国家里，儒学具有相当不同的内涵，它受那个社会本身的历史制约，不可能是抽象孤立的。在近代之后，儒学在东亚不同社会中的潜在功能更加不同，对此，已经有大量的个案研究可以证实。因此，假如儒学视角是观察东亚的出发点，那么，我们

不得不从儒学在各个社会的差异性而不是类似性出发,需要调动的不是直观经验而是对于历史结构的想象力。即使是试图以“传播学”的思路来确认儒学在这个区域内的走向,目标也很难设计为到底谁是“始祖”谁是“后继者”,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在传播过程中的流变: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在于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对于儒学的“再塑造”功能,儒学从来不可能脱离政治环境以真空状态去“旅行”。如果以儒学为视角建立东亚论述同时又以直观的态度把东亚各国的儒学视为同一个东西,这样的东亚视角将会由于缺少历史和现实性格而变成一纸空论。

其实,在严格意义上说,儒学视角并不必然地等同于东亚视角,这是后来附会的历史叙述,并不能等同于历史逻辑本身。对于儒学而言,东亚的框架并不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东亚这个后来形成的历史叙述框架而言,儒学却是一个必要的黏合剂。因此,儒学作为“今天的视角”,其功能不在于认识“东亚的历史”,而在于力图论证当下存在着一个有着内在结合力的“东亚”。观察一下现有的“东亚儒学”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论述的功能在于通过“儒学”来消解东亚(而且基本上是中、日、韩)的内在差异,以求建立一个统一的相关叙事结构。

第二种关于东亚的视角其实是受到日本影响的。这就是“现代化”视角。把东亚视为一个赶超和对抗西方以求实现现代化的区域,是日本在明治之后一直以曲折方式追求的思路。这个思路潜在地规定着日本知识分子思考东亚时的视角。在今天日本的东亚论述里面,也仍然再生产着这样的思路。在这个思路里,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与其说是对抗西方的盟友,毋宁说是赶超西方的竞争对手。^①谁代表东亚,一直是个潜在的

^① 代表这个思路最高水准的力作当推山室信一的《作为思想课题的亚细亚——基轴·连锁·推动——》,岩波书店2001年版。此书利用大量资料集中讨论了日本乃至东北亚在近代转型期的“近代化焦虑”问题,把东北亚地区各国视为回应西方近代的挑战,相互争夺近代化主导权的竞争对手。该书指出,亚细亚主义是东北亚地区在遭遇了17世纪以来西方的世界认识之后发生的关于自身认知方式的变化,它带来了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文化习俗乃至政治实践的连锁反应。该书提供了很多精彩的分析和资料的线索,特别是充分考虑到了“国家利益”与思想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一部了解日本亚洲主义脉络的重要著作。但是,该书在结构意识上完全忽略了在亚洲主义问题上中国、日本、朝鲜之间的非均质特征,并且把近代转型期东北亚地区的近代化焦虑放大为亚洲主义的绝对前提,从而在客观上简化了这个思想课题在跨越国界时的历史复杂性。尽管如此,在理解日本近代以来关于亚洲主义见解的意义上,此书仍然具有高水准的代表性。

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成为某种社会公认的意识形态,日本的这种东亚论述也就随之获得了进入中国的可能。通过论述东亚,为现代化在东亚的形态找到某种表现方式,从而也就形成了潜在的共识:这将是东亚成为某个相对整合的系统的基础。但是,作为现代化视角的东亚论述暗含了一个方向性的误区:东亚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将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被加以纵向排列,而各国乃至地区所谓“现代化”的内容差异则被一笔勾掉,“西方模式”以一种同样整合的形式被抽象为某种既定的现代化样板,似乎现代化只有一种形态,那就是以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来完成“福利社会”的建设。在这个视角之下,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东亚论述暗含着一个进化论的逻辑:处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东亚地区,最终将一同走向同一个现代化目标。因此,先发达的国家必然地把后发达国家的现状视为自己的“昨天”,相反,后发达国家则把先发达国家的今天看做自己的“明天”。

还有第三种视角,这就是关于战争的创伤记忆视角。东亚地区之所以可以构成一个整体论述的框架,有一个沉痛的因素是不可无视的,这就是战争记忆。在二战之前就开始伺机侵略中国大陆并在其后把战火燃向东南亚国家、强化对朝鲜半岛和台湾的殖民统治的日本,是东亚的一个残酷的“黏合剂”。到目前为止,在战争记忆的层面使得东亚社会获得相对深入共识的,主要是东北亚地区,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进步势力在追究战争责任和正确传承战争记忆方面的努力是不可低估的要素,它使得东亚受害国的战争记忆有可能转化为日本社会变动的外在压力,同时也使得受害国民众的创伤记忆有可能得到某种回应。近年来关于教科书事件、靖国神社参拜事件、慰安妇诉讼、细菌战诉讼、日军遗留化学武器被害者索赔等等一系列事件,使得日本的战争处理问题不得不“国际化”了。这个过程带来了一个并非预设之中的收获,就是东亚的民间社会开始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融合,使得东亚的相关人士跨越国界站在一起,形成了一些共识,这是非常重要的进展。不过,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种进展伴随着相当深刻的内在紧张,而这种内在紧张暗示着调整认识论的客观需求。第一,在讨论战争创伤记忆的时候,个人的记忆只有被整合进国家

框架论述中去的时候才能获得历史记忆的形态,而在此种情况下,“国家利益”将构成绝对的前提。于是,在一国框架内不会成为问题的视角,在进入“东亚”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问题。编写“三国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可贵的探索,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在有关历史事件的评价问题上,三国的执笔者需要进行非常困难的协调才能形成相对统一的论述,原因在于“国家利益”是一个很难简单跨越的制掣。问题在于,如果战争这一现代性最核心的事件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同时战争又分为加害国与受害国,战败国与战胜国,那么问题就不太容易简化为一视同仁的“批判和超越国民国家”。因为一视同仁的批判将混淆上述这些具体状况中的种种历史脉络,在客观上为加害国免罪;但是同时,如果不把批判和否定国民国家作为既定的视角,那么,是否意味着历史书写必须认同于受害国和战胜国一方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当受害国(战胜国)不止一个,相互之间又有着利益冲突的时候,在整体上使用二分法来处理战争历史,会遇到巨大的认识论困难:这导致人们避开那些纠缠不清的关键性分歧,而抽象地使用“赞成还是反对”这样的粗疏判断来回避问题。这些涉及国际政治学基本原理的问题原本就非常复杂,再加上日本政府在战后受到美国掌控,与台湾签订了单方面和约,从而使得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战后处理工作拖延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进行,这就留下了大量的遗留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受害国的中国面对了太多的历史头绪,这也就使得中国大陆的社会舆论很难在认同国家框架之外找到处理战争的视角。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于东亚视角的一个挑战。第二,在如何处理战争记忆的问题上,其实各国的有识之士基本上受制于本国的历史脉络和社会思潮,他们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态度并不可能一蹴而就“东亚化”,这也就意味着东亚不同区域的有识之士并没有进入可以一致行动并且建立相互深度理解的阶段。事实上,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东亚的进步人士之间并没有建立共识,特别是在当下冷战意识形态并未真正解体的情况下,曾经分属于冷战两大阵营的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进步知识分子和运动人士还没有真正跨越冷战想象达成思想上的共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尽管日本的很多有识之士已经对左派史学家考证死亡者

数字的做法不以为然,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日本的左翼人士考证死者数字的动力不仅仅是为了回击右翼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也暗含了对于“集权主义的中国”缺少言论和学术自由的想象。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舆论对于日本左翼的这种考证方式也缺少历史性的分析和同情之理解,有时会用极其简化的二分法将其归为“右翼”。

如上种种,作为战争记忆的东亚视角至今仍有着生命力,但是它却缺少一些基本的要素,那就是对日本的侵略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战后冷战格局这一历史流动性的关注。特别是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后,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政治势力的组合关系已经完全变为另一种结构,而这另外一种结构恰恰是从二战之中发展出来的,因此,在当下讨论中日之间的战争历史,就不能无视其后的国际局势发展,追究战争责任的工作与关注历史流动性的工作不能截然分开。否则,单纯切断历史很难清理历史逻辑本身;而如果要把战后的历史也纳入历史视野,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设定问题:东亚(在此,姑且把东亚先等同于东北亚)是否可以简单地视为中国大陆和台湾、朝鲜和韩国、日本的集合体呢?

事实上,上述三种论述东亚的视角,所指涉的对象本来是有所不同的:儒学视角可以涵盖儒学实际发生功能的地域,因此东南亚的一部分区域例如越南、新加坡等等应该进入这个视野;而现代化视角则容易把韩国视为朝鲜半岛的代表,甚至导致朝鲜的缺席,同时,这个视角可以涵盖中日朝鲜半岛的时期是比较短的,在国家之间的动态平衡被打破之后,它不得被战争视角所取代。至于战争记忆的视角,如果历史性地设定,则很难把东亚想象成为一个封闭的独立视角,因为这段历史无法把美国、苏联等排除在东亚之外,更何况美国的军事基地至今仍然还存在于日本与韩国的领土之上,而朝鲜半岛南北之间至今也不过是“休战”状态,“停战”还没有真正实现!至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至今也仍然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性格,对于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具有不可小视的影响力。

但是当我们讨论东亚的时候,这种种差异却基本上被忽略,从而导致了—一个抽象的“东亚框架”的形成。加之日本与韩国的东亚论述暗含了“中、日、韩(有时候是中日朝鲜半岛)”这一框架,它强化了东亚论述的固

定意象,且进一步把其建构成三个国民国家的组合。恰恰是这个东亚视角的抽象性,使得本来与我们的历史最为贴近的“东亚”在我们的精神与思想世界中无法找到确切的位置,从而也使得大量有价值的个案研究缺少有效地转化为中国知识界思想资源的媒介。

建构东亚论述的视角,是一个历史性很强的论题。换言之,这是一个流动的、无法固定化的视角,因而,具有很强的变化形态。透过东亚视角,我们可以观察的不是某些固定的意象,而是这些意象在历史沿革过程中的流动状态。恰恰在这样的流动状态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自身主体形成的某些关键环节,讨论其可能变革的方式。

为了建构这样的历史性视角,我希望以今天我们身处其中的“东亚”作为出发点,构想可以相对有效地观察战后至今的东亚视角。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否定前述已经形成的那些既定框架,而是相反,我希望在既定的东亚分析框架中增添一个新的构想,以面对在上述视角中被忽略和回避的那些问题。作为初步的探索,我希望下述讨论可以激活已有的亚洲或者东亚讨论一直不能面对的一个基本困惑:我们为什么非得谈东亚不可?这个视野是否有独立存在的必要?

二、现代历史过程中东亚内部的不均衡状态

为了建立东亚视角,有一个基本的思维前提是不可否定的,这就是东亚必须是一个可以相对独立的对象。作为一个论述单位,东亚应该是相对自足的,至少是可以按照某种思维逻辑加以整合的。这也正是“东亚共同体”作为一个命题得以存在的原因。尽管当今东亚地区的内在紧张尚未缓解,但是“共同体”的设想却在顽强地表达着一个主观意志:不能成为一个组合整体,东亚还有什么资格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存在?!

一个基本上不需要援引萨依德就可以确认的事实是,东亚的成立是由于西方的命名。但是当我们提到这个命题的“出身问题”时,其实问题并未到位。因为,这里面潜在着需要进一步拓展的两个问题:第一,假如东亚是西欧的反命题,或者说是为了西欧建立自我意识而作为媒介被制

造出来,那么东亚的一体性是否也是来自西欧命题的延伸?换言之,我们今天强调东亚这个范畴的“西欧出身”,仅仅是为了打破所谓东亚的“非西欧本质主义”想象,还是为了进一步追究它的认识论特征?假如是前者,那么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讨论的前景,作为结论,它已经有了足够的正当性;但假如是后者,那么问题就需要澄清了。对于东亚人来说,这个范畴并不仅仅是在西方强加的意义存在,它包含了东亚人自身的认同欲望,但是由于被作为对抗西方近代的代名词,更由于日本曾经把东亚想象转换为“大东亚共荣圈”这样的以日本为中心且伴随战争暴力的血腥过程,因此,东亚的命题就不再能够仅仅以“西欧的远东想象”作为主轴,因为它反倒会模糊我们历史中那些最沉重的部分。第二,与上一个命题互为表里,东亚地区对于西欧的想象也同样具有“整合性”的特征。正如西欧人(包括欧盟成员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倾向于接受把他们视为一个整体的看法、而东亚人的西欧想象却是整体性的一样,外在的视角总是倾向于把对方整合起来,而内在的视角却更倾向于关注其中的差异性。在这个意义上,东亚是谁的概念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视角的历史沿革带来了什么样的自我确认。

在近代之前,东亚这样的范畴不具有真实的意义。作为地缘政治的范畴,东亚的存在与西方近代的入侵和渗透有着直接的关联。但是,当这个范畴一旦形成,它的功能就脱离了它所由形成的原因,具有了单独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过程中,其实把东亚论述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困难的。特别是经历了日本以“亚细亚主义”开始以“大东亚共荣圈”告终的悲剧性插曲之后,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论述变得更困难了。而且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东亚论述中,其实一直隐含着一个根本性的难题,这就是谁来代表东亚的问题。当年,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明显地表达了“王道”的意图,与其说这是一种国家中心的论述,毋宁说它是一种文明观的论述;但是,无论现实中的孙中山政治处境如何,更无论当时的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究竟是否获得了真正的自觉,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毕竟不是一种多元主义的国际政治论述。这也就难免会引起对于“大国中心主义”的联想和批判。这中间,特别是来自韩国的批评,有助于理清这一